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41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百一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政坛琐记

新中学会与新中革命青年社 焦实斋(1)

我所知道的新中学会——新中革命青年社的始末

章乃器在安徽 孙诗圃(21)

忆我在华岁月 魏璐诗(30)

徐永昌与阎锡山的离合 辜达岸(39)

徐的出身简介——由反阎而投阎——受阎倚重任

要职——为阎运动再起——阎、徐的勾心斗角

——离阎投蒋居要津——徐、阎互相利用

文教科科技

廉方教学法实验始末 李秉德(51)

缘起——接受任务，开始实验——实验内容简介

——社会影响——变革及结束——尾声

医学界的英美派与德日派之争 傅 惠 邓宗禹(64)

工商史话

在天津的宁波帮 张章翔(75)

宁波帮在天津发展的开端——宁波帮与官僚及帝

国主义的勾结——宁波帮 50 年来的盛衰

我创制“赖茅”茅台酒的经过…………… 赖永初(89)

从常州分行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经营管理

…………… 唐汉圣 唐哲如(97)

灵活多样地吸收存款储蓄——开展多种信贷业务

——建立严格人事管理体制——上海银行的副业

及其业务概要

昙花一现的上海久安设计部…………… 周志俊(105)

人物述林

戴季陶二三事…………… 黄贻谋(109)

神秘的王亚樵…………… 郭 超(115)

寻求出路 几遭通缉——北伐结束 走向反蒋

——脱险出奔 泛舟横渡——叱咤西南 梧州遇

难

蒋纬国的岳父——石凤翔…………… 赵广庆(132)

小蒋与石景宜的罗曼谛克——石凤翔的应世秘术

——大华财团的经营作风

军统内幕

从奋勇队到别动军…………… 胡啸华(138)

战区便衣混城队(奋勇队)概述——武进便衣混

城队的情况——第三战区奋勇队——军事委员会

别动军——别动军的结束

军统局本部的日常规章制度…………… 赵广庆(152)

工作概况——出入门禁——会客——通信——伙食——衣着问题——督察制度

戴笠轶事(下)…………… 申 元(159)

错发奖金，戴笠糊涂——禁止结婚，戴笠杀人——争风吃醋，戴笠认错——外圆内方，戴笠失信——欺世盗名，戴笠办案——私设军队，戴笠弄权——破译密码，戴笠得功——中统求“欢”，戴笠拒绝——衣锦还乡，戴笠碰壁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和部分重要会议简况

(1931年——1949年)(下)…………… 高晓星收集整理(189)

政坛琐记

新中学会与新中革命青年社

焦实斋

作者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职。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参加了爱国青年组织“新中学会”，同时又是国民党内北方的一个派系——“新中革命青年社”成员。本文着重介绍了这两个组织的联系、区别及其创办、组织、活动等情况。

我所知道的新中学会

1923年，我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由学校推荐到交通部天津扶轮中学教书。就在当年，天津南开中学教师于纪梦（炳祥）介绍我参加了新中学会。新中学会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组织。虽然称为“学会”，却不是纯学术团体，而是带有政治性的群众团体。

新中学会于1917年成立于日本东京。最初是由几位天津南开中学的留日同学——高仁山、杨扶青、周恩来、陈铁卿、刘东美、杨伯安、童冠贤、李峰、黄开山等，经常在一起聚会，畅谈国家大事，有感于内忧外患，国事蜩螗，不胜忿激，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均誓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己任。高仁山、童冠贤倡议组织团体，凝聚力量，探讨和实践救国救民之道。这些人都是进步的爱国青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彼此声应气求，均

抱有救国富民，改革社会的理想。高、童的倡议，一唱即和，均表赞同，并联合在国内志同道合的马洗凡等人共同发起，建立组织，命名为新中学会。“新中”即建设新中华之意。于是租定东京早稻田雀卷町 12 号为会址，题为“新中寄庐”；起草《会宪》（即学会章程），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心烈胆，为国为民。《会宪》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从这个宗旨看，虽然激于爱国热情，对当时政治不满，抱有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目的，但是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路线和纲领，更没有刷新中国的具体措施，从政治思想上来看是比较模糊的，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道路。当时吸收会员的条件是很严格的，它是根据个人品德和私人间相互感情而吸收入会的。参加者都是志行纯洁、爱国爱民、有为有守，并与某些会员感情笃厚，相知有素的人。因为采取宁缺勿滥的态度，所以人数不多，最初的会员只有 50 余人。新中学会颇具特色的一点是既没有具体领导人，如会长、主席、理事长等，也没有领导机构，如执委会、理事会等。开会时公推一人为主席，多半是年高德劭者。日常的会计、出纳等工作，则是由公众推举两三个事务人员管理。学会的中心人物是童冠贤、马洗凡、高仁山等，会内一切主要事务，如召集会议，制订议事日程等，多半由他们协商决定，所以他们几位，便形成新中学会的实际领导人。

新中学会虽创立于日本，但以后发展到国内外，其中不少是留学美、英、法、德各国的学生。“五四”运动以后，留学日本和欧美各国的会员陆续回国，分别在北京、天津各大学工作，会员逐渐增多。总会乃由东京迁到北京，租定鲍家街 27 号为会址，命名为“新庐”，办理会务，开展各种活动。

这一时期，新中学会的成员，为了学有所用，实现理想，从事社会活动是颇为活跃的。新中学会虽然没有具体的政治纲领，但是都具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抱着改革社会现状，促使民富国

强的强烈愿望，均希望施展专长，对社会有所建树。其在社会事业上曾进行了各种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

其一、为了推行教育救国的方针，曾有一个庞大计划，拟创办一所艺文院。它是包括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院以及医院、图书馆、博物馆、试验所和运动场等设施的完整的教育基地。俾能从教育入手，开通民智，发挥影响，以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首先创办一所艺文中学，建立基础，再逐渐扩展。1925年初，由新中学会募集基金，于中南海东侧，购置校舍，推举会员高仁山、查良钊、陈翰笙、薛培元等组织董事会，由查良钊任董事长，高仁山任校长，陈翰笙等为董事，进行筹备，于当年8月开学。该校教学方法与一般中学不同，不是通常的由教员讲解，学生听讲那种灌输式的教育方法，而是采取“道尔顿制”，即学生以自学讨论为主，由教师进行辅导的启发式教育。具体办法是由各科教师编写教学大纲，学生按大纲规定的进度进行学习，每天由教师组织讨论、观摩、实践和辅导，并加强对学生的爱国教育及培养学生劳动能力等。经多年实验，成绩非常显著。以后除初中外，又增设高中、小学、幼稚园等。小学采取设计教学法。幼稚园当年在北京极少，聘请思想进步、热爱儿童教育的优秀女青年主持。幼稚园与小学衔接，小学与中学衔接。方图发展大学及其他设施时，发生了意外变故。是时，校长高仁山早已参加中国共产党，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幸于1927年与李达先生先后为反动军阀逮捕，惨遭杀害。高仁山牺牲后由薛培元、李鸿敏、查良钊、顾淑型（陈翰笙夫人）、陶曾毅（高仁山夫人）等先后继任校长，持续发展。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校长及多数教师离校，投入抗日工作，仅赖少数留校教师维持。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接收，改为市立第28中学。

其二、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1920年，由新中学会集股，共筹款20万元，在河北省昌黎县创办“新中罐头食品

公司”。昌黎背靠盛产水果的盘山，面临海产丰富的渤海，是生产罐头得天独厚的地方。产品一律以新中学会会徽“赤心”为商标。由新中学会成员杨扶青担任经理。该公司经营了18年，虽几经变乱，仍蓬勃发展，产品行销各地，颇著声誉。其经营方针，也与一般工厂不同，主要的不是通常的厂主与工人的那种关系，而是类似合作社那种互相协作的关系。经理、技师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18年如一日。工资按全厂获利多寡及工人劳动成果分成。厂内设小学及成人业余学校，奖励好学优秀者。还组织工人成立互助友爱会，由工厂捐助基金，职工按月交存所得的1%，凡遇婚丧疾病及其他困难，从中给予补助或救济，每至旧历年终清还一次。厂内设有医院，职工患病，负责医疗，亲属患病，少量收费，确有困难，予以补助。此外还设有职工储蓄会，根据自愿，职工按全月收入，储蓄10%，厂方每月以公积金赠储总数之半；满10年，职工可提取全部本息，用以独立经营其他事业；不满10年，确有需要者，亦可暂借或提取。另外，以部分盈余资助留学国外而经济困难的新中学会会员，这也是办厂的目的之一。周恩来同志在国外留学时便不时由该厂汇款资助。因该厂职工每月收入较其他工厂优厚，所以职工均有以厂为家，爱厂如家的思想，工作积极，生产蒸蒸日上。1926年新中学会解体后仍继续开办，原新中学会投入的公股，全部捐赠该厂，直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始被迫停业。

其三、1921年新中学会会员安体诚、于树德等自日本回国，在天津法政学院任教。他们认为进行劳工运动，首先应从劳工教育入手，遂以新中学会名义，创办工余补习学校，招收各工厂、商店的工人、学徒，利用晚间，教授国文、算术、珠算、时事常识等课程，并灌输劳工运动等知识。后来安体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学校便成为工人运动的基地了。

其四、与“少年中国学会”联为友会。“少年中国学会”是1919年夏成立的，它是在“五四”运动激流中诞生的著名社团。

发起人为李大钊、王光祈^①、邓中夏、田汉、宗白华、袁同礼、周炳琳和许德珩等，会员主要是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该会宗旨是“本科学之精神，为社会之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虽含有政治性，但也和新中学会相仿佛，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鲜明的政治路线。因新中学会与少年中国学会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所组成，也都是主张反对军阀，反对列强侵略，主张提倡科学，发扬民主，刷新中国政治，旨趣大体相同。经李大钊建议，两个学会联为友会，成为兄弟社团，互相交流和支援，为振兴中国而努力。后来少年中国学会的大部分左派会员，均加入共产党，极少数变成国家主义派分子。李大钊先生被害后，新中学会与少年中国学会的联系也随之中断。

其五、参加远东民族会议。1922年1月，列宁为了促进远东各国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进行民族革命运动，倡导由共产国际邀请中、日、朝、蒙、越南、印度、印尼等国家和地区的进步人士，在莫斯科召开远东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方面委托李大钊负责组织参加。当时各党派和人民团体应邀参加者30余人。新中学会推举于树德代表新中学会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当前中国以及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敌人；指出被压迫民族组成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中国和东方各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新中学会首次参与国际活动。于树德回国后，曾在新中学会作了详尽的传达，对会员政治思想的启发与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六、通过话集方式，团结知识分子，充实力量。当时，我在天津教书，在津会员约有三四十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活动是“两周话集”（即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座谈会），由会员轮流主持

① 有的文章认为“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的第一名应是王光祈。

会议，主持人根据当时的形势来确定主题，讨论时均作记录。“话集”主要是进行学术探讨、专题研究以及对时事分析。通过“话集”大家一起畅谈国家大事，既增进了会员之间的友谊，也提高了对国家形势、社会情况的认识。我们还注意团结其他学校有进步思想的教师，邀请他们来参加“话集”。通过这种方式，吸收了不少会员。记得当时经常参加这个集会的有南开大学的刘东美、凌勉之，天津法商学院的王宣、崔敬伯，南开中学和扶轮中学的于纪梦、魏敬初和我等人，我们定期集会，从未间断。

其七、出版会刊。为了交流思想，联络感情，在北京新中学会总会，刊印《新中学会会刊》发表会员撰写的有关学术和对时事分析的论著、译述及各地会员活动情况的通讯。1926年新中学会解散时停刊。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随后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大改组，由于政治思想倾向的不同，新中学会的会员逐渐分化。当时周恩来、安体诚、于树德、高仁山等会员加入了共产党，并已实际参加了革命活动。其他会员有的致力于实业，如杨扶青在昌黎创办新中罐头厂；有的埋头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如薛培元在北京农大，查勉中在北京师大，刘东美在天津南开，陈翰笙在北大；有的另有政治结合，如童冠贤、马洗凡、张清源等则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这样，新中学会的分化危机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1926年夏季，新中学会举行了最后一次年会，正式宣告解散。会员们激于多年的感情，不胜唏嘘，有的竟失声哭泣，最后依依不舍地互相握手离去。

总之，新中学会从诞生到解体，整整10年，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在“五四”前后，不失为一个发挥了一些有益作用的进步团体。尤其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不论会员中加入了共产党，还是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都在以

李大钊先生为首的国民党北方执行部领导下，共同奋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革命青年社的始末

新中革命青年社是在本世纪 20 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改组后的国民党内部在北方成立的一个小派系。它最初虽然是新中学会中参加了国民党的一些成员组成的，但与新中学会已经毫无关系。有些不知内情的人仍称它为“新中学会”，或称它为“新中革命同志会”、“新新中学会”，甚或称之为“兴中学会”都是错误的。新中学会是一批知识分子自由组织的一般社会团体，不属于任何党派，而新中革命青年社则是国民党内在北方的一个派系，两者性质根本不同，完全是两回事。有些报刊和文史资料，把两者混淆起来，纯粹是误会。我既是“新中学会”的成员，又是“新中革命青年社”的成员，对此有必要予以澄清。同时，关于新中革命青年社”的史料，我还未听到有人写过，对 60 年前这段史实，我想根据我的回忆，把它写出来，也算是“拾遗补阙”吧。

把新中革命青年社和新中学会混为一谈，虽属误会，然也是事出有因。其一，从名称上都是冠以“新中”二字，这本身就很容易令人误会；其二，确有一些新中学会成员，参加了新中革命青年社。我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原新中学会的中心人物童冠贤、马洗凡，便是新中革命青年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三，在新中学会解散前，其中一部分成员参加过多次政治性活动，特别应该指出的，新中革命青年社成立于 1925 年冬，新中学会解散于 1926 年夏，两者有一段时间同时存在。其成员参加共同的政治活动，究竟谁属于新中学会，谁属于新中革命青年社，外人扑朔迷离，难以辨别，这更是导致混淆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两者绝不是一回事，这是不容置疑的。

新中学会解散前一段时间，也就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前后，新中学会的一些成员，思想倾向逐渐分化。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共产党；有的认为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于中国国情，而服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当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时期，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共同目标下两党协同作战，对发展革命运动，有一定的历史功绩。

当时，为了共同斗争的需要，有些共产党员，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具有双重党籍。例如在北方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李大钊先生和新中学会成员于树德，便都是共产党员并以个人名义又参加了国民党的。他们与国民党的丁惟汾、顾孟余等人共同领导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工作，有些活动都是共同参加和组织的。在新中学会解散前，有些新中学会的成员，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都在国民党北方执行部领导下，参加了许多次政治活动，其中主要的可以举出以下一些：

一、与西山会议派的斗争。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一批以元老自居的右翼分子——谢持、邹鲁、林森、居正和张继等人，于当年11月，跑到北京西山碧云寺中山先生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妄自通电解除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任中央部长的职务，开除国民党内共产党人的党籍。这当然激怒了拥护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共两党人士。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对这批人的分裂活动，非常愤怒，一致声讨。新中学会成员均积极参加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活动。西山会议派那些人，不但得不到北方国民党和群众的支持，反而遭到严厉的抨击和谴责。他们在北京挨了重重的打击，不得不相继逃往上海。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新中学会中不论政治倾向如何，都是行动一致，紧密配合。这可以说是在北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一次胜利成果。我当时在新中学会，也参加了

这次活动，并初次认识了团结的重要，认识了发动群众的重要。

二、参加孙中山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1926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为扩大革命影响，发动和组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追悼大会。这次大会除了悲痛追悼中山先生外，特别强调遵行中山先生的遗嘱和他的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内容。这是一次充满革命激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大会。新中学会和新中革命青年社的成员们，对发动和组织这次大会，都争先恐后的踊跃参加。

三、参加“三一八”示威游行。1926年3月18日，也就是在中山先生逝世周年追悼大会后的第6天，以李大钊为首的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发动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各大中学校同学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是日晨，各团体和各校学生，云集天安门前，在会场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方，悬挂大字横幅，上书“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场上纸旗挥舞，群情激昂，口号响彻云天，气氛激忿热烈。上午10时许，由大会主席团的朱家骅宣布开会，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委员徐谦演讲大会的意义。最后通过抗议“最后通牒”，废除《辛丑条约》和成立反帝大同盟组织等决议。会后，由李大钊、丁惟汾等率领开始示威游行。从天安门出发到铁狮子胡同反动军阀头子段祺瑞的执政府请愿，遭到反动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47人，伤300余人。新中学会和新中革命青年社均有不少人参加这次请愿游行，并有人受伤，新中学会创办的艺文中学学生陈时芬牺牲，教师顾淑型受伤。反动当局在惨案后，还污蔑游行是“赤色分子”率领暴徒袭击政府，实行暴动，并发出通缉令，被通缉的有李大钊、顾孟余、徐谦、李石曾、蒋梦麟、丁惟汾、朱家骅、高一涵和鲁迅等55人。多半是著名学者和教授，其中也有新中学会和新中革命青年社成员。

四、“三一八”惨案后仅一个多月，即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下台逃往天津，奉直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国民党北方执

行部为了配合南方蓬勃发展的形势，加强领导，对下属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进行了改组，改选吴可、谢伯俞、谭祖尧、莫同荣（以上为共产党）、邓文辉、肖忠贞、张挹兰（以上为中山主义实践社）、刘耀西（新中革命青年社）和路友于（三民主义大同盟）等9人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这时新中革命青年社刚诞生不久，即推荐刘耀西（女）当选为执行委员兼任妇女部长，这是新中革命青年社成员最早参与国民党在北京的党务领导活动。

新中革命青年社（下简称新中社）诞生于1925年冬。已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原新中学会成员童冠贤、马洗凡等人，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在党员中，对《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以及对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缺乏真正了解，理论水平很差，不利于开展工作，便约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商讨举办一个研究理论的学习班，定名为“三民主义研究会”，利用学校放寒假期间，在北京西城的平民中学秘密开班（因为平民中学校长张清源是原新中学会会员，也是主要参加者之一）。第一批参加者有童冠贤、马洗凡、梁子青、魏劲初、卜哲民、于纪梦等30余人。大家推举童冠贤为主任，马洗凡、张清源为副主任。学习内容有关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他的学说，还有《国民党一大宣言》、《社会主义三大来源及三个组成部分》、《家庭私有及社会起源》、《论合作社》以及三大政策的具体任务，妇女问题，青年运动的方针和策略等。

学习方法除了童冠贤讲演时事和阅读上面所说的书刊外，主要采取互教互学方式，由大家轮流报告学习心得，然后互相讨论。大家学习兴趣很浓。通过学习，提高了理论认识也学会不少在秘密时期的工作方法。

后来，童冠贤看到研究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便建议在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他认为国民党经过改组后，组织仍不够严密，党员革命意识不够强烈，对开展工作不利，建议成

立一个组织，作为国民党内的核心力量，起到骨干作用。他还提出这个组织就定名为新中革命青年社，这个组织要具有真诚的革命热情和坚强意志，要有铁的纪律，对外要严守秘密。参加的人以自愿为原则，不要互相商量，自己经过深刻考虑后，写一张愿意参加新中革命青年社的誓言，投入一个锁好的木箱里。开箱后，发现凡是参加学习的人全部自愿参加，大家为此在春节时还举行了庆祝会。

1926年1月份，又继续举办第二期研究会。这时我已由张清源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并参加了第二期研究会。这一期的参加者我现在能记忆得出的有：杨亦周、宋荔泉、钱瑞智、莫子镇、于纯斋、王述先、崔敬伯、王养斋、王德瑞、苏蓬仙、卢有信、傅筑夫、寿普轩、王南复、王文田等人。学习内容和第一期相同，只是由第一期学过的人参加辅导，学起来更为顺利了。学习地点改在西城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基督教会的干事包宗容曾参加第一期研究会，是新中革命青年社的骨干分子。他精明果敢，具有强烈的革命热忱。因他的关系，研究会改在这里举行。学习讨论时，在小教堂里，每人面前摆放一本圣经，造成基督教徒传经布道的假象，以掩盖外人耳目。参加学习的人热情很高，收获不小。这批人以后均成为新中社的骨干。缸瓦市基督教会在以后也成为新中社在北京的主要秘密据点，由包宗容负责主持。

在这一时期，华北的国民党内部，出现不少小派系，除新中社外，还有三民主义大同盟，主要领导成员为丁惟汾、郭春涛、邓飞黄、路友于等；中山主义实践社，主要领导成员为邓文辉、萧忠贞、罗方中等人；还有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组织的新军社，主要成员为于树德、韩麟符等。以上这几个团体，都属于国民党北方执行部领导下的左派，并在北京市党部领导下，成立左派联席会议，形成革命统一战线。坚决奉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坚持执行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分裂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

新中社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学术界、教育界的爱国进步人士，学有专长，人才济济，与人多势众的大同盟和实践社可谓鼎足而三。新中社与实践社的关系，比较密切，斗争目标及行动步调，基本一致。国民党右派分子虽然勾心斗角，兴风作浪，然力薄势孤，终难匹敌。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议接受孙中山先生遗嘱，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举包括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吴玉章、邓颖超、恽代英等14人在内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共同协商，布置出师北伐。此时，童冠贤、丁惟汾也都到了广州。

当时新中社在北京和天津各有两个秘密据点，在北京的除了由包宗容主持的缸瓦市基督教会外，另一个就是刘耀西主持的女青年会；天津的一处是设在日租界，由我和我的妻子丁一清担任掩护工作，另一处设在法租界，由王宣和隋灵璧二人以兄妹关系作掩护（大约一年以后，在英租界又增设一处，由王述先、崔朴贞主持）。我们之间，虽然彼此都知道，但没有横的关系。我当时还担任地下交通员的工作，负责在天津与北京之间传送消息，并送达广东（北伐后在武汉）。那时没有无线电台，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文件，除了以暗语打来的电报外，主要靠专人从海路送到天津，交到我手。我用五倍子水写在纸上，缝在鞋底里，直接送到北京；再将北京的请示报告带回天津转到南方。在我担任地下交通员期间，因为小心谨慎，一直平安无事。

1927年4月6日，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领导人李大钊、范鸿劼、路友于、邓文辉等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接着原新中学会成员，北京艺文中学校长、共产党员高仁山也被捕入狱，均惨遭杀害。5月中，新中社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会的秘密据点，由于叛徒告密，也遭破坏，主持人包宗容被捕死难；密藏于该处的商震所部寄存的若干枪支、弹药，也均被查获。

李大钊先生等被害后，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和北京市党部已完